



周恩来：严守机密的光辉典范

□于晓奎

回忆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的光辉事迹，既是一种缅怀，更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继承发扬周恩来优良的保密工作精神和实践，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涉密人员强化保密意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恩爱情侣不知对方身份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参加革命斗争的初期起，就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他们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只谈理想和情感。直到1924年9月，周恩来自欧洲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他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共产党员。1925年8月，两人结婚后经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去上海，组织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邓颖超仍留在广州。行前，周恩来对去上海的任务守口如瓶。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起义取得胜利，邓颖超才知道起义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开国总理。自1949年9月起，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和居住了26年。他的办公室同时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保密室，除了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这间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他始终带在身上，睡觉时压在枕头上，有外出任务时，才把钥匙密封好交给邓颖超保管。有一次他走得匆忙，直到临上飞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于是他把钥匙封好让一位同志转交邓颖超。而每次回来的时候，见到邓颖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取回来。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此前周恩来向主管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特别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直到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邓颖超才知道此事。

周恩来身患癌症后，有一次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他们知道最后的诀别即将到来，却都不该对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体现出高度的保密意识和责任。

保密工作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南昌起义之后，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要求全党转入秘密斗争，提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要做好保密工作”。此后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的秘密工作委员会，由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等保密工作文件，成为我党最早的保密工作文献之一。

1927年秋，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由军委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当时特科的主要

工作是为党中央设立秘密办公地点。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为特科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纪律，如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一切活动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随后，特科为党中央建立了三个秘密工作点。党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后召开的几次中央全会，也是由特科布置的会场。

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家都义愤填膺。与此同时，党中央两次急电，特别要求周恩来尽速离渝。周恩来慎重考虑后，向党中央表示不能撤离。

1月17日，局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召集办事处工作人员开会，他说：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决不能让其得手。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处立即成立了保密小组，制定保密条例，并立即严格执行。各部门迅速清理机密文件，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可以随时销毁；办事处内部配备报警装置和石灰包、沙包，以便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烧毁文件。

由于周恩来始终把保密工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他的领导下，有力地维护了党的机密，为党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要求秘书严守保密纪律

每个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他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

他要求秘书这样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平时涉及重要事项，他都用专线电话。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有时加密机出现故障，他仍然坚持加密后再通话。对涉密会议，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并提出具体要求。如工作人员可否在场、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入会场倒水等细节作出明确交代。他每次参加会议均自己做记录。去世后，他留下几大皮箱手迹，其中属于党和国家秘密的，他都分门别类放在保险柜里。对密级高、时间紧的文件，他都要求专人专送专办。

办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周恩来一直坚持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每次秘书跟随他乘车外出，在车上他给秘书布置任务前，先按下电动按钮，待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这才向秘书布置任务，之后再按按钮把隔断放下去。他这样做不是对司机和警卫人员不信任，而是尽量减少知悉者，缩小涉密范围。

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但从不搞神秘化，而是实事求是。有一位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每次给周恩来报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写上“亲启”“特急”“绝密”。有一次他启封阅看后笑着对秘书说：“这位同志亲自写报告、写信封是好的，字也写得十分工整用心，但每次都注上‘特急’、‘绝密’也没必要。如果没有轻重缓急，都是急事也就不急了，都是绝密也就没密了。”

保密精神令基辛格钦佩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消息一经公布，世界为之震动。

周恩来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并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的关键。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1971年7月1日，基辛格一行从美国起程，途经西贡、曼谷、新德里，8日抵达伊斯兰堡，然后采取“遁身术”，于9日凌晨3时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飞机，在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特别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并亲自检查警卫、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做到周到有礼、万无一失。

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与他举行了6次总计17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之后，基辛格才悄然离京，重返巴基斯坦并经巴黎回国。直到7月15日中美双方才同时公开发表基辛格访华公告，中美秘密接触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才公之于世。

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对这次秘密访华深感满意，他对周恩来的过人才智、光辉品格、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改善中美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为钦佩。

（摘自2008年第6期《秘书工作》）



我党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而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在我党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以为他不过是傅作义起义的追随者而已。在经过了近50年默默无闻、差点被湮灭的时候，历史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他真实版的“潜伏”经历。

阎又文，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后，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

入党誓词中“保守党的秘密”的来历

□ 聂文婷

保守党的秘密，是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纪律。它伴随党的成立而产生。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其具有越来越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次对保守党的秘密作出明确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在次年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党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再次规定：凡“泄漏本党秘密”的党员，“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保守党的秘密关系党的安危。大革命后期，由于叛徒出卖党的核心秘密，使党一度遭受惨痛损失。为提高全党保密意识，1927年8月7日，党中央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在工作中还存在“对于党的秘密工作尤不懂得需要经常地有系统的注意”的缺点，“致常常因一隅之事失败影响到整个党的安全与发展”，因此，“党应严重注意秘密工作”。

会议提出：“任何一个党员，在他被敌人捕去后，不管是有无证据，他对于革命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唯一的忠诚与责任，便是：不供出任何党务，不承认任何关系，不指出任何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抗战需要，党中央对保密工作的整体要求作了重大调整，其基本原则即“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保密工作与群

众工作相结合”。这一时期，党对保守党的秘密的要求更加具有灵活性和现实性。但对党员的保密要求依然十分坚定。1939年1月25日，陈云撰写了《发展党员问题》的讲话提纲，论述了党员入党誓词，其中第三条是“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不叛党（秘密）”，第六条是“保守党的秘密”。此后，以这一讲话提纲为蓝本，中央组织部颁布了抗日战争时期标准的入党誓词。随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入党誓词的诞生，保守党的秘密成为党的铁的纪律，延续至今。

在入党宣誓词中强调保守党的秘密，是党进行党员保密纪律教育的重要方式。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曾对入党宣誓词进行两次微调，但保守党的秘密都具有重要地位。以入党宣誓的方式为起点，保守党的秘密逐渐融入到党员的血液之中，成为党员进行工作的基本遵循。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二大对入党宣誓词作了修改，并首次把包含保守党的秘密的入党誓词写进了党章。新时期党对保密工作非常重视，尤其要求高级干部更要注重保密。1990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保密委员会关于高级干部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的规定》，对高级干部保密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至今，保密依然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

（摘自2016年5月22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保守党的秘密》）

□ 孟兰英

年一道毅然奔赴延安。阎又文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简称“边保”）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王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7年。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以降低暴露身份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是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几个人，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

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下发。这期间，阎又文与王玉先后

交谈了多次，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有可能近期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王玉就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然而此部队领导听后摇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此时，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后来，他向李克农汇报了此事。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果然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绥东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后来，李克农曾语气温重地总结说：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程度不够。若干年后，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此时，又是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共中央。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阎又文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在其逝世后，仍不为人知30多年。要不是后来因为机缘所致，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摘自2018第7期《党史纵横》，原标题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党保密战线上的故事》）

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此时，又是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共中央。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阎又文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在其逝世后，仍不为人知30多年。要不是后来因为机缘所致，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摘自2018第7期《党史纵横》，原标题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党保密战线上的故事》）

刘伯坚：宁死不屈 保守党的秘密

□魏雪莲



“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1935年3月，刘伯坚在狱中写信给大嫂，如是说。

此前的3月4日，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留守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在江西信丰塘村，面对敌众我寡，他指挥部队突围时身中数弹，不幸被俘。对国民党政府而言，这是一位红军的大人物，早就悬赏五万银圆，并将他的照片发到各国剿匪队。所以，没过多久刘伯坚就被指认出。

敌人的团长亲自出面进行劝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这样的才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这位团长表示，只要刘伯坚暂时办理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刘伯坚一口回绝：“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要干革命就得有危险。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

敌人多次诱降无效，便用十多斤重的铁镣押着刘伯坚游大街，妄图从精神上瓦解他的斗志。刘伯坚昂首挺胸，向两边围观的群众频频点头致意，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使敌人的诡计破产。

这天晚上，他写下浩然正气的《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踽踽复踽踽，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敌人逼迫刘伯坚承认所有被俘的人。刘伯坚望着朝夕相处的战友，摇摇头说：“我不认识他（她）。”后来，许多被俘的同志被当成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给释放了，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敌人仍不死心，继续讯问刘伯坚。敌人追问：“你们野战军奔川野的意图是什么？”他作了回答，却是这样说的：“此次主力红军进军川黔

的意图很明确，是将苏维埃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去。现在日寇入侵，为保卫国家疆土，我们更需要号召和团结千百万群众实行民族革命战争。”这个回答既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也使敌人对刘伯坚彻底死心。

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日子里，与敌人抗争的同时，刘伯坚也给家里写下了几封家书。

3月16日，他写信给大嫂。信中嘱咐说：不要去找与他有交情的国民党要人冯玉祥、于右任等来营救他，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3月21日，刘伯坚留下最后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对大嫂说：“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憾，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夫人的：“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1935年，刘伯坚怀着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牺牲于江西大余，时年40岁。

（摘自2016年第12期《中国纪检监察》）

